

# 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

## ——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内生政策变迁理论

### Soci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ndogenous Policy Transition i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刘晓峰 陈钊 陆铭\*

**摘要:** 本文构建了一个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内生政策变迁理论，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模型的重点。我们证明，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早期，对于移民的歧视可能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但是当城市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城市内移民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对于移民的公共服务歧视也会加剧城市内部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力之间的福利差距和社会冲突，而这又将造成社会资源的非生产性消耗，阻碍城市化进程，并有损于城市户籍人口的利益。这时，均等化公共服务的社会融合政策就可能内生地产生，并相应地减少不同身份的居民间的福利差距和社会冲突，促进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

**关键词:** 社会冲突 城乡分割 城市化 内生政策变迁

---

\* 刘晓峰、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通讯作者：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200433，电子邮件：[zhaochen@fudan.edu.cn](mailto:zhaochen@fudan.edu.cn)。作者感谢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JL008）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790010）的资助，同时本文也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建设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感谢 Yoshihiko Seoka、罗长远、王弟海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研讨会参与者对本文的评论与建议。

# 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

## ——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内生政策变迁理论

### 一、引言

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发展的主题（Lewis, 1954）。而在马克思看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对于中国来说，当 2009 年二三产的 GDP 比重已经接近 90% 的时候，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不足 46.6%，<sup>①</sup>实证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蔡昉等，2003；陆铭和陈钊，2004；Lu and Chen, 2006），城市内部有无本地户籍的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和教育回报差距也在扩大（Meng and Bai, 2007；Zhang and Meng, 2007），这意味着，发展并不只是城市化加工业化。传统的发展理论所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往往是在城乡分割的背景下进行的（陈钊和陆铭，2008），因此，经济发展理论应该是一个同时包含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理论，而且，这个理论应该能够解释从社会分割到社会融合的政策转变是如何内生地实现的。

本文将构建一个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理论，其中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模型的重点。我们将证明，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早期，对于移民的政策歧视有利于城市居民更多地获取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对移民的歧视性政策会造成城市内部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力之间的福利差距和社会冲突，并且进一步导致社会资源的非生产性消耗，当城市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城市内的移民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通过社会融合来减少收入差距和社会冲突，就反而可能更有利于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面对着日益扩大的城乡间收入差距和城市内部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群间的收入差距，惠农政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正在成为新的政策取向，一个通过社会融合来推动城市化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时代正在到来。本文则从理论上刻画了这种内生政策变迁的内在形成机制，是内生的制度变迁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运用。

本文研究的意义并不只局限于中国本身。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分割以及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横向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y）是广泛存在的（Stewart, 2002）。在当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当农村移民向城市流动时，移民的财产权或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力往往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保障（de Soto, 2000；2002），经济政策的城市倾向性也普遍存在（Lipton, 1977）。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分割往往与种族、肤色、种姓等结合在一起。在欧美国家，100 年前也曾经有过对于低收入阶层、黑人和女性的歧视，今天的欧美又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移民问题，新的社会分割又再次出现。随着城市人口在 2008 年超过全球总人口的一半，与社会分割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发展问题将越来越显得重要，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将成为发展理论的新的焦点。

本文的其余部分将作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对有关城市化、社会分割以及内生政策（或制度）变迁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第三部分构建了存在社会分割的二元经济模型，其中社会分割表现为移民不能平等地享受提供给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从而造成与身份差异有关的福利（实际收入）差距。第四部分考察社会分割向社会融合的内生政策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含义。

### 二、文献评论

对于本文所涉及的主题而言，文献评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此，我们仅从三个方

---

<sup>①</sup>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面来对主要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第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理论的进展如何？第二，有关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我们知道什么？第三，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如何内生地实现的？

Lucas (2004) 提出，一个成功的城市化理论应该包含这样一些方面：首先，它应该能够描述传统的农业在移民过程中逐渐消失的过程；其次，这个过程应该持续几十年，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传统农业和现代经济是并存的；第三，这个过程中，那些进入城市工作的人之间应该能够获得均等化的收入。在 Lewis (1954)、Ranis 和 Fei (1961) 的二元经济理论中，移民过程，以及传统农业和现代经济的长期并存得到了刻画，但他们只是将城市内部的发展简化成了一个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过程。Todaro (1969)、Harris 和 Todaro (1970) 注意到了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他们的解释是，虽然面临失业风险，那些进城的移民的期望工资可能仍然高于（或等于）农村的收入，所以他们仍然不愿意离开城市。而 Lucas (2004) 则认为，来自农村的移民在城市中进行着人力资本积累，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现代经济中的技术工人与传统农业中的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逐渐扩大的。然而，这些文献都没有足够地重视在现代城市内部持续存在的社会分割和收入差距。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城市化进程，或者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和菲律宾）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参见 de Soto, 2000, 2002），或者在全球化进程中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国际移民浪潮，我们将发现，假设移民与城市的原有居民天然享有同样的权利是非常不现实的。恰恰相反，移民与原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分割是理解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视角。因此，随着城市化理论的发展，我们有理由要求一个成功的城市化理论应该还具备第四个特征，那就是刻画城市内部从社会分割到社会融合的变迁过程。这正是本文要做的工作。

在中国，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日益扩大（蔡昉等，2003；陆铭和陈钊，2004；Lu and Chen, 2006；万广华，2006），而且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李实和佐藤宏，2004），特别是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Knight and Song, 2003；Meng and Bai, 2007），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教育回报差距在扩大（Zhang and Meng, 2007）。在这些现象的背后，与户籍制度相伴随的社会分割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背景。这样的制度环境究竟将对中国的城市化以及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现有的研究通常都侧重于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角度加以考虑，例如蔡昉等（2003）对城市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现象的研究。然而，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和收入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却较少地被正式纳入到城市化理论中去。陈钊和陆铭（2008）在城市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不同户籍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所带来的社会冲突，证明了持续扩大的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可能阻碍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持续发展，但他们所考察的城市收入差距来源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性政策，并且也没有考虑这种基于户籍的歧视性政策发生内生变迁的可能性。虽然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在中国是长期存在的现象，但是，近年来这种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性分割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sup>①</sup>于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消除了劳动力市场上对非城市户籍人口的歧视，实现了城市内部的平等就业之后，城市的社会和谐就能够因此实现吗？本文将说明，除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性歧视之外，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群之间在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平等地位是造成两类人事实上的收入和福利差距的更为长期的原因。这种公共服务享受方面的不均等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不均等，它对于收入（福利）差距、社会冲突、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的影响几乎完全被现有理论所忽视。

本文将研究的城市内部从社会分割到社会融合的转变，即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从不均等到均等化这样一个政策的内生转变过程。近来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特别注意刻画政策的内生变化，但现有文献尚未将政策（制度）变迁的动力建立在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这样的微观基础之上。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0) 曾经提供了一个类似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欧洲历史上会出现公民权的扩大，他们的观点是，掌权阶级推动社会融合是为了避免收入差距

<sup>①</sup> 2008 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更是在法律层面上为城乡劳动力的平等就业提供了制度保证。

过大,从而导致革命发生,但这个内生的政策变迁理论并没有被纳入到一个经济增长或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虑,因而不是一个有关经济发展的动态理论。陈钊和陆铭(2008)研究了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并认为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但是,他们的理论没有刻画政策变迁的内生过程。

与本文较为接近的是将内生政策与经济增长结合在一起的研究。Acemoglu等(2006)构造了一个制度变迁内生于经济发展的模型,他们认为较为落后的经济体可以通过模仿获得经济增长,但领先的经济体的增长则依赖于创新。而模仿与创新这两种增长机制需要不同的制度来匹配,例如企业组织形式、合同安排、信贷体制等等。因此随着落后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创新将越来越重要,原本作为经济增长保证的适宜的制度就需要进行变革,以获得进一步的经济增长。Galort和Moav(2004; 2006)的内生经济政策理论试图解释欧洲历史上政府扩大公共教育覆盖面的政策变化。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较大的收入差距恰好有利于富人进行物质资本的积累。但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力资本的回报将超过物质资本,这时,政策制定者将有激励通过公共教育的提供来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并追求更高的利润。与这些理论相比,本文首先将内生的政策变迁纳入到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理论之中。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以及由此导致的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不和谐程度的提高,使得中国站在了关于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重大调整的历史时期。本文将证明,在这个关键的转折阶段,如果政府能够主动地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融合,那么,城市的收入差距将缩小,生产性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都可以被加快。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虽然他们的相对经济地位会下降,但由于城市经济更快增长了,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在政策转型之后也将获得更快的增长。认识到当前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两大目标的一致性,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实践意义。

### 三、基本模型

#### (一) 假设与均衡

我们考虑一个城乡二元经济,劳动力分布在城市与农村两个部门中,并且总量保持不变。假设其中具有城市户籍的劳动力即城市居民的数量也保持不变,并标准化为1。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部门务工,假设初始时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为 $N > 0$ ,而 $t$ 时期进入城市部门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记为 $m(t)$ ,显然, $0 \leq m(t) \leq N$ 。城市部门在 $t$ 时期的产出由如下Cobb-Douglas形式的生产函数决定:<sup>①</sup>

$$Y(t) = [1 + m(t)]^\alpha K(t)^{1-\alpha}, \quad (1)$$

其中 $K(t)$ 为城市部门在 $t$ 时期的资本积累<sup>②</sup>, $0 < \alpha < 1$ 。而同期农村部门的产出则表示为:

$$Y_r(t) = [N - m(t)]^\beta, \quad (2)$$

其中 $0 < \beta < 1$ 。这里我们假设农村部门的生产以劳动力和土地为投入,土地的数量固定不变,也被标准化为1。

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针对农村移民的工资的制度性歧视正在逐渐消除,因此,本文并不着重分析这种劳动力市场上的政策歧视。我们假定在城市就业的劳动力按其劳动边际产出获得相同的工资,即:

$$w(t) = \alpha[1 + m(t)]^{\alpha-1} K(t)^{1-\alpha}. \quad (3)$$

然而,在城市就业平等化实现的同时,基于户籍的歧视性的公共服务提供政策仍然使农村劳动力难以平等地获得来自城市公共服务的收益。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长期以来,中国教育资源的配置严重向城市地区倾斜,特别是优质的基础教育往往仅向当地户籍的城市

<sup>①</sup> 这也就隐含地假定了劳动力是同质的。

<sup>②</sup> 在以下分析中可以发现, $K$ 的取值也可代表城市的经济规模。

人口开放，而农村移民能享受的基础教育条件则相对较差。<sup>①</sup>第二，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的高等院校获得了大量来自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于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省级行政单位实际上拥有了更多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这些机会并不能被非户籍人口所获得。第三，直到我们完成此文的 2009 年，社会保障仍然不能跨地区可接续，地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主要是医疗和养老）基本上只覆盖本地城市居民，农村移民很难通过参加社会保障来同等地获益，即使有些地方为外来农村移民提供特殊类型的社会保障，其待遇也低于本地居民。<sup>②</sup>第四，政府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务也主要服务于本地居民，甚至存在为维护部分城市居民利益，对农村移民进行限制或损害他们利益的情况，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城管”。<sup>③</sup>另外，一直以来农村地区居民相对缺乏影响政策的话语权，这也使得在制度环境上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平等地分享城市的公共服务。从政策操作的层面看，减轻公共服务分享上的不平等程度也需要较长的时间与复杂的政策措施。于是，一个在理论上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性政策已经消除，但城市公共服务的分享仍然存在户籍上的歧视，那么这将对城市的经济增长以及城市内部的社会和谐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便于分析，我们假设进城务工者完全不能分享城市的公共，因而其实际的人均收入就等于劳动工资，即：

$$c_m(t) = w(t)。 \quad (4)$$

类似地，我们也不考虑城市政府对农村移民数量的控制，即假定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选择进城务工或者继续留在农村部门。在陈钊和陆铭（2008）的模型中，城市政府对移民数量加以控制，这也等价于对城乡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进行控制。在本文中，城市内部就业的平等化意味着城乡劳动力能够获得相同的工资水平，因而这种对移民数量的控制机制也就不存在了。随着现实中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少，这样的假定也就变得更为接近现实，并且，也能够把我们的分析集中到公共服务不平等这一点上来。对于留在农村部门的劳动力，我们将其收入简化为农村部门的人均产出，即假定农村部门是按劳动力数量进行平均分配的：

$$c_r(t) = Y_r(t) / [N - m(t)] = [N - m(t)]^{\beta-1}。 \quad (5)$$

农村劳动力是选择进城务工还是留在农村部门，就取决于哪种情况下的实际收入比较高。显然，在均衡状态下，进城务工与留在农村部门的实际收入将是相等的，即  $c_m(t) = c_r(t)$ ，由上述(2)-(5)式，我们有：

$$c_m(t) = \alpha[1 + m(t)]^{\alpha-1} K(t)^{1-\alpha} = [N - m(t)]^{\beta-1}。 \quad (6)$$

即在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选择进城务工或者留在农村部门时，均衡的移民数量与城市的资本存量必然满足如下关系：

$$[1 + m(t)]^{1-\alpha} / \{\alpha[N - m(t)]^{1-\beta}\} = K(t)^{1-\alpha}， \quad (7)$$

注意到  $dm/dK > 0$ ，如果比较两种资本存量  $K_1 < K_2$  的情况，则均衡的移民数量也满足  $m_1 < m_2$ ，如图 1 所示。

<sup>①</sup> 尽管面向城市居民的教育资源分配也存在诸如“划片入学”等基于户籍所在的歧视性制度，但城市居民可以利用买房产来获得进入优秀学校的途径，而这对于农村移民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

<sup>②</sup> 即使最近社会保障开始覆盖农民工群体，也由于保险金跨地区转移的制度障碍而使得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受益有限。在 2008 年 11 月人民网和中国工会新闻网推出的“中国职工十大期待”调查中，35.25%参与调查的网友希望“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

<sup>③</sup> 城市政府部门的执法更倾向于本地居民的现象在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屡见不鲜，见 de Soto（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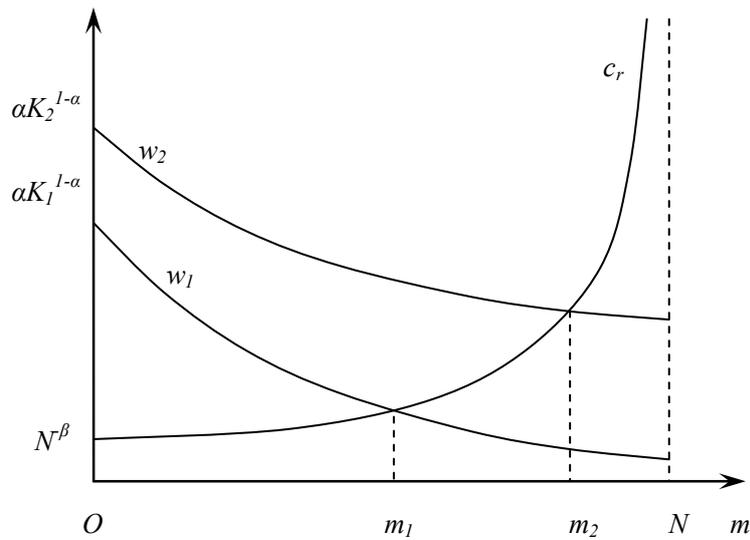


图 1 城市资本存量与均衡移民数量的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一：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进城务工的移民数量也将增加。

另一方面，拥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劳动力由于享有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获得了工资以外的收入。由于不拥有城市户籍的进城务工者无法分享这一来自公共服务的福利，因此事实上就导致了城市内部这两类劳动力之间实际的收入或福利上的差距。这种由于不同社会身份所导致的两类群体间的横向不平等很可能成为他们之间产生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Stewart, 2000; 2002），城市社会的和谐程度将因此而受到影响。城市部门将需要更多地投资于防范社会冲突的发生或保护居民财产，这种非生产性的投资事实上构成了对城市产出的耗费。

收入差距的上升会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恶化社会投资环境，并且使更多的资源用于保护产权，从而降低具有生产性的物质资本积累（例如 Benhabib and Rustichini, 1996）。实际上的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城市社会产出的损耗既包括实际发生的损失，如犯罪带来的损失（Blau and Blau, 1982; Kelly, 2000; Fajnzylber, et al, 2002），<sup>①</sup>又包括为防止这种损失而付出的代价，如社会在制定法律、防止犯罪过程中动用的资源。据统计，在 1990 年代中期，城乡收入差距处在一个阶段性的低谷，此时，侵财案件数也相对较低。之后，城乡收入差距与侵财案件的发生率同步上升，每 10 万人侵财案件数已经从 1996 年的 103 上升到了 2004 年的 289，两者的上升过程都呈类似“W”形，并且侵财案件数的变化相对滞后（陈钊和陆铭，2008）。陈春良和易君健（2009）利用 1988-2004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的刑事犯罪率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以及其他相关社会经济变量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水平以及跨省迁移人口比例都与刑事犯罪率显著正相关。在防范犯罪方面，1988-2004 年间，中国各省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各县（包括市辖区）、市及省级公安财政经费开支总和——占地方 GDP 的比例的平均水平从低于 4% 提高到接近 7%。<sup>②</sup>在犯

<sup>①</sup> 现实中当然存在着犯罪率较高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快的城市，以及犯罪率较低但投资及经济增长速度都较为缓慢的城市，但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复杂的，本文的目的仅在于分析其中的一种机制，并且我们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机制对城市的和谐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sup>②</sup> 如果以 2008 年的 GDP 来计算，如果县、市、省的公安财政经费占 7% 的话，相当于中国 13 亿人口每人

罪率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以及外来人口比例越高的地区地方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增长的幅度越大(樊鹏和易君健,2009)。事实上,由于户籍身份的差异而产生的间接影响还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的后果。例如, Knight 和 Gunatilaka (2008)发现,中国的农村移民在进入城市以后在生活上的比较对象是城市居民,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不仅低于城市居民,也低于农村居民。陆铭和蒋仕卿(2008)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城市居民,非城市户籍的农村移民会因为身份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更加不满意,并且农村移民不会因为在移民群体中相对收入的提高而更加满意。汪汇、陈钊和陆铭(2009)的研究也发现,农村移民对城市社会及城市政府的信任水平更低,并且这种低信任水平还可能由于城市的居住区划分所导致的同群效应而进一步被放大。

无论是两类劳动力之间显性的冲突或者对城市产出隐性的耗费,城市内部这种“用拳头投票”的机制无疑将对城市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sup>①</sup>在本文中,我们用如下形式的函数来描述由于实际上的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城市社会产出的损耗:

$$\Delta(t) = \theta[\eta(t)m(t)]^\varphi, \quad (8)$$

其中,  $\eta(t)$ 是对城市内部两种劳动力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刻画,  $\eta(t)$ 的取值越大,这种收入不平等越严重,我们将其标准化为如下的函数形式:

$$\eta(t) = 1 - c_m(t) / c(t) \geq 0, \quad (9)$$

这里的  $c(t)$ 为城市劳动力的人均实际收入(包括工资收入与公共服务福利)。这里我们把对城市内收入差距的考察集中在本地居民和农村移民之间,因为与一般意义上的个体收入差距相比,这种两类社会群体之间的横向不平等对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更大的影响(Stewart, 2000; 2002)。

(8)式中的中括号内是城乡劳动力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与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的乘积,我们用其度量城市内部社会不和谐的程度  $G(t)$ , 因而有:

$$G(t) = \eta(t)m(t) = \{1 - [N - m(t)]^{\beta-1} / c(t)\} m(t), \quad (10)$$

我们后面讨论各种相关因素对城市社会和谐程度的影响都将基于对这个变量的影响。显然,城乡劳动力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越大,则  $\eta(t)$ 的取值越大(越接近于1),  $G(t)$ 的取值也越大,城市社会的和谐程度越低。

参数  $\theta$  ( $\theta > 0$ ) 度量的是城市中的农村移民对城乡劳动力之间收入差距的敏感程度,例如,我们可以将参数  $\theta$  取值变大理解为,如果城市内部两个群体间收入差距持续存在(即使没有持续扩大),随着农村移民在城市中获得越来越丰富的信息以及在城市社会中主体意识的增强,他们对此将更为不满,这将造成更多的城市部门产出被消耗于控制城市社会潜在冲突的非生产性投资上。参数  $\varphi$  ( $\varphi \geq 1$ ) 表示城市内部不平等对社会的潜在影响不只是不平等程度在人际间的简单加总,而是具有某种放大效应,这源于城市具有较强的集聚效应以及较为密集的社会网络,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信息传播的便捷快速使得城市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更容易积聚与爆发。

从支出角度看,城市部门的总产出由消费、投资以及上述由潜在社会冲突造成的损耗构成:

$$Y(t) = C(t) + C_m(t) + I(t) + \Delta(t), \quad (11)$$

其中  $C(t) = c(t)$ 为拥有城市户籍数量为1的劳动力的总收入,  $C_m(t) = c_m(t)m(t)$ 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的总收入。<sup>②</sup>简单起见,我们不妨假设每期的城市资本投资占当期总产出的比例为一个固定的值  $s$ ,

负担约 166 元。

<sup>①</sup> 我们把社会冲突引发政策变迁的机制称为“用拳头投票”。经济学通常只研究“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而较少关注弱势阶层“用拳头投票”这种机制。

<sup>②</sup> 也就是说,城市部门的资本所得在扣除了投资和社会冲突损耗之后的部分,就是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得到的公共服务收益。

$$I(t) = sY(t), \quad (12)$$

其中  $0 < s < 1 - \alpha$ ，即在每一期城市都会按一定比例进行资本积累。由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式以及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式，我们有：

$$c(t) = (1 - s)[1 + m(t)]^\alpha K(t)^{1-\alpha} - [N - m(t)]^{\beta-1} m(t) - \theta G(t)^\varphi. \quad (13)$$

而由  $G$  的函数形式(10)式，我们可以得到：

$$c(t) = [N - m(t)]^{\beta-1} / [1 - G(t)/m(t)],$$

于是，(13)式可以进一步写成：

$$(1 - G/m)^{-1} = (1 - s)(1 + m)^\alpha (N - m)^{1-\beta} K^{1-\alpha} - m - \theta(N - m)^{1-\beta} G^\varphi. \quad (14)$$

对于任意一个城市资本存量  $K$ ，(7)式确定了均衡的移民数量，在此基础上，(14)式就确定了城市内部社会不和谐的程度  $G$ 。如图 2 所示，图中的曲线 AA 和 BB 分别代表(14)式等号的左右两边，它们分别是  $G$  的增函数与减函数，它们的交点就决定了均衡状态下  $G$  的大小。事实上，(14)式等号的左边即曲线 AA 表示的是在其它条件给定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对社会不和谐程度的决定；而等号右边即曲线 BB 则是社会不和谐程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将(7)式代入(14)式等号右边不难发现，无论城市资本存量  $K$  是多少，只要城市的资本收益没有完全用于投资， $s < 1 - \alpha$ ，那么 BB 曲线在纵轴上的截距就是大于 1 的，曲线 AA 和 BB 必然会相交，因而必定有： $G > 0$ 。由此，我们得到本文的第二个命题：

命题二：即使不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歧视，只要城市政府不能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那么城市内部的社会不和谐就必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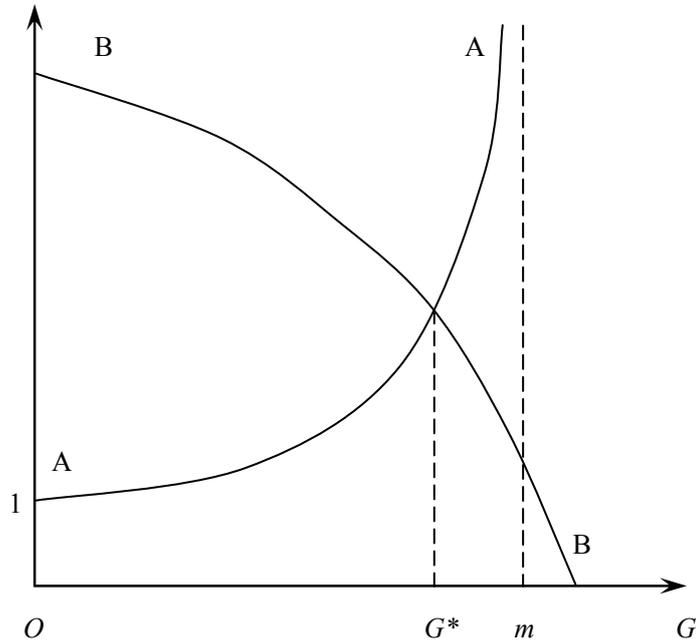


图 2 城市社会不和谐程度的确定

## (二) 比较静态分析

命题二也意味着，城市公共服务分享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不和谐并不会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自动消失。那么其严重程度是否会随城市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减轻，甚至能够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呢？如果这样，那就意味着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均等化可能并不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政策措施。因此，我们接下来考察城市资本存量  $K$  的变化对均衡

的社会不和谐程度的影响。

我们把(7)式代入(14)式可以得到：

$$(1 - G/m)^{-1} = (1 - s) / \alpha + m[(1 - \alpha) - s] / \alpha - \theta(N - m)^{1-\beta} G^{\phi} \quad (15)$$

由命题一，均衡时的移民数量将随城市资本存量的增加而增大，即  $K$  的增加将使  $m$  的值变大。由于城市社会的不和谐程度与收入差距和移民数量相关，在相同收入差距情况下，均衡移民数量的增加将使社会不和谐程度上升，因此如图 3 所示，曲线  $AA$  将向右移动至  $AA'$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资本的积累，在给定城市社会不和谐程度时，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大于农村移民收入的增加，因此收入差距将扩大，即(15)式右边所代表的曲线  $BB$  向上移动至  $B'B'$ 。显然，此时由曲线  $AA'$  与曲线  $B'B'$  的交点决定的社会不和谐程度  $G'$  的值将更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本文的第三个命题：

命题三：随着城市的经济增长，公共服务不均等所导致的城市社会的不和谐程度将越来越为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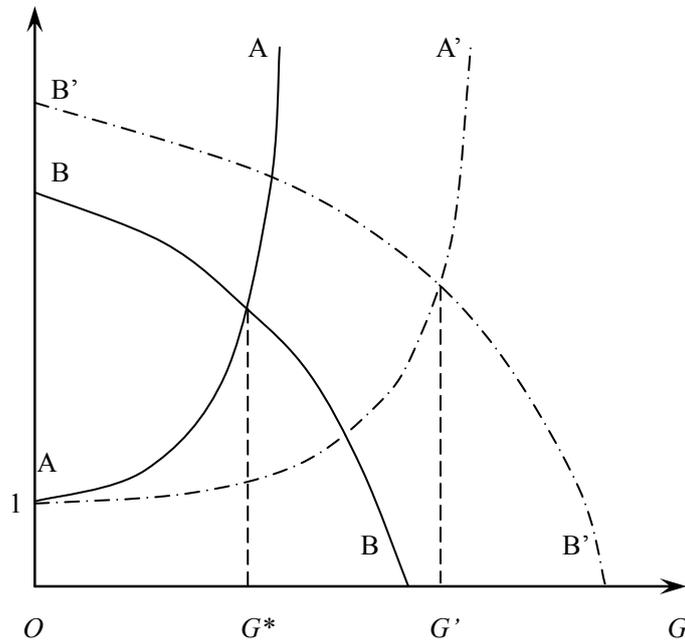


图 3 城市经济增长与公共服务分享不平等的负面影响

综合命题二和命题三，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城乡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不存在差异，公共服务的不均等提供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仍然将导致城市社会的不和谐，并且这种社会不和谐将随城市的经济增长而持续存在并不断扩大。这与中国城市不和谐因素日益增多的观察是相吻合的。

#### 四、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均等化：内生的政策变迁

##### (一) 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均等化

根据上文的分析，在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工资水平条件下，城市社会公共品分享的不平等是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的重要因素。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来考察另一种公共服务提供的政策，即城市内的农村移民也能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享用城市的公共服务。此时，城市部门同时实现了就业的平等化与公共服务提供的平等化，因此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将不再存在，城市内两类劳动力的收入均为：

$$c^E(t) = c_m^E(t) = [(1-s)Y(t)] / [1 + m^E(t)] = (1-s)K(t)^{1-\alpha} [1 + m^E(t)]^{\alpha-1}, \quad (16)$$

这里的上标  $E$  表示公共服务提供的平等化。而农村移民的均衡条件要求收入满足如下等式：

$$c^E(t) = c_m^E(t) = (1-s)K(t)^{1-\alpha} [1 + m^E(t)]^{\alpha-1} = [N - m^E(t)]^{\beta-1}. \quad (1)$$

与(6)式对比，(17)式的右边没有发生变化，而左边显然满足对于任意的移民数量  $0 \leq m(t) \leq N$  均有：

$$(1-s)K(t)^{1-\alpha} [1 + m(t)]^{\alpha-1} > \alpha K(t)^{1-\alpha} [1 + m(t)]^{\alpha-1},$$

即图 1 中的  $c_r$  曲线没有移动，但  $w$  曲线现在上升了，因此均衡的移民数量将增加。同时由于现在  $c^E(t) = c_m^E(t)$ ，始终有  $G = 0$ 。

而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当城市居民单独享有城市的公共服务时，城市居民的收入由前文中的(13)式所示，即：

$$c(t) = (1-s)[1 + m(t)]^\alpha K(t)^{1-\alpha} - [N - m(t)]^{\beta-1} m(t) - \theta G(t)^\varphi,$$

其中：

$$G(t) = \{1 - [N - m(t)]^{\beta-1} / c(t)\} m(t),$$

而移民数量  $m(t)$  满足(6)式：

$$\alpha [1 + m(t)]^{\alpha-1} K(t)^{1-\alpha} = [N - m(t)]^{\beta-1}.$$

我们可以利用数值模拟来对这两种公共服务的提供政策进行讨论。我们设定相关参数的取值情况如表 1 所示。事实上，我们的模拟结果对所取参数在取值附近范围内的变化并不敏感。

表 1 数值模拟参数取值

$\alpha$	$\beta$	$s$	$N$	$K(0)$	$\theta$	$\varphi$
0.3	0.5	0.1	5	5	1.6	1.9

在上述参数结构下，两种公共服务提供政策下城市经济的不同发展路径将如图 4 所示。其中的横轴都表示时期，而(a)、(b)、(c)、(d)各自的纵轴分别表示城市居民的收入、城市部门的总产出、城市的资本存量以及农村移民的数量，其中的实线都表示仅有城市居民能从城市公共服务中获益的情况，而虚线则表示农村移民能够与城市居民平等分享城市公共服务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城市公共服务只向城市居民提供，那么在城市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即城市资本积累较少时，城市居民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但是随着城市经济增长，虚线所代表的公共服务提供平等化政策下的城市居民收入将以较快速度上升，并最终超越前者（图 4(a)）。而从城市部门的产出和资本存量上看，即使在城市经济增长的早期，实行对城市居民有利的公共服务提供不均等政策也会使得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速度较慢，总产出较低（图 4(b)、(c)）。这意味着，即使在城市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城市政府实行不均等的公共服务提供政策看似是保护了城市居民的利益，但事实上是以牺牲城市部门的产出和经济增长为代价的。此外，实行城市公共服务平等提供的政策也将使农村移民的数量大大增加（图 4(d)），这将极大的推进城市化的进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本文的第四个命题：

**命题四：**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完全均等化能够推进城市化进程，并且能够消除由公共品分享不平等带来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城市社会的不和谐，并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居民长期收入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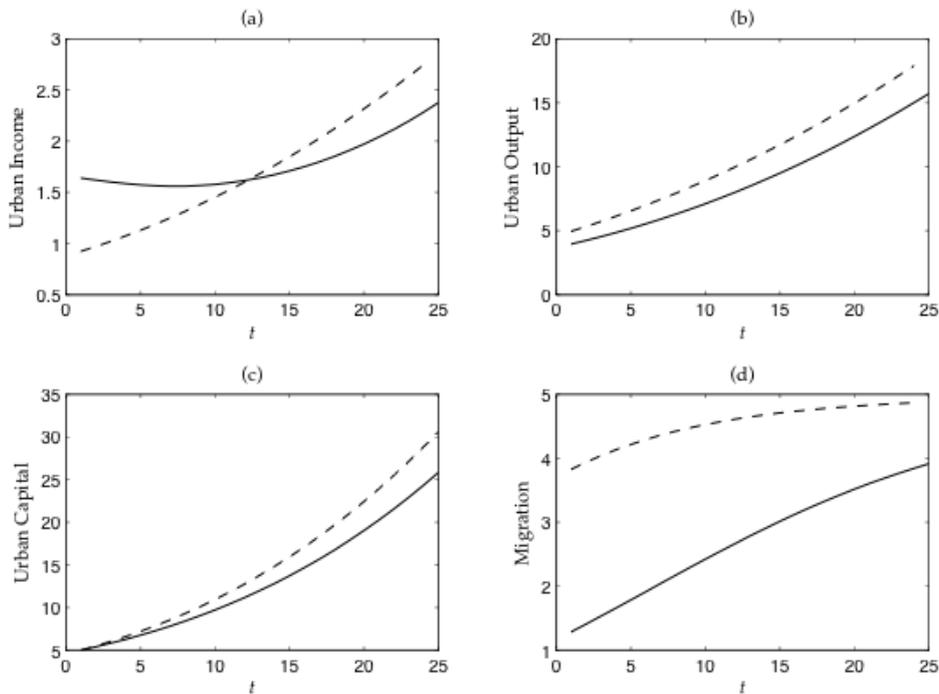


图 4 两种公共服务提供政策的比较

尽管上述分析表明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均等化将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且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以后也有利于城市居民的福利,但是在城市户籍人口左右政策制订这个前提下,公共服务提供政策从不平等向平等化的转型仍然可能遭遇阻力。如果在平等地向城市居民和移民提供公共服务以后,城市居民的收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那么政策转型的阻力势必会比较大。但如果政策转型以后,城市居民的收入并没有下降甚至还有所上升,那么,这样的政策转型就相对容易实现。对于一个以城市居民福利为主要目标的城市政府而言,这种对城市居民有利的政策转型将更有可能是一个自发选择的内生变迁过程。因此,在公共服务提供平等化以后,城市居民的收入变化将是决定这种转型能否自发实现的重要参数。此外,由于公共服务提供的平等化将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为城市居民带来更大的收入增幅,因此在何时选择进行政策转变也与政府对居民长期福利的关注程度有关。下面我们将通过考察公共服务提供政策的转变对城市居民当期收入及长期收入的影响,来分析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否在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自发实现,以及这种自发转型可能发生的时机。

## (二) 政府关注城市居民当期收入时的内生政策转型

我们首先考虑城市政府以最大化城市居民的当期收入为主要政策目标的情况。事实上,本地居民对减少其当期收入的政策变迁的反对很有可能是阻碍公共服务提供均等化的最大阻力。但如果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公共服务提供政策的平等化转型在当期就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收入,那么这种阻力也就不再存在,城市政府将有可能自发地选择这样的政策转变。事实上在图 4(a)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代表两种公共服务提供政策下城市居民收入的两条曲线存在着交点,在这个交点之后的时期内,虚线所代表的向农村移民平等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政策会使城市居民获得更高的收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随着城市经济的增长,进城务工的农村移民数量将增加,如果维持公共服务只向城市居民提供的政策,那么由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冲突损失将持续增加,而这种损失将减少城市居民从公共服务中所获得的收

益。也就是说，即使城市政府出于维护本地居民当期福利的考虑，在城市资本存量较低时只向城市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在一定的经济增长阶段以后，实行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平等化也有可能是更优的。因为这不仅会提高农村移民的收入，也会提高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由不均等向均等化的转变就有可能是一个可以自发实现的内生变迁过程。

但图 4 中描绘的是两条单独的发展路径，而城市政府在做政策变迁时机的选择时，事实上面临的并不是这样两条路径之间的选择。我们不妨假设每一期在给定城市资本存量的情况下，城市政府都可以准确地“计算”在该期只向城市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向农村移民平等提供公共服务两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并选择其中城市居民收入更高的一种政策。图 5 中的实线利用与表 1 中所列完全相同的参数取值模拟了在上述设定下城市的最优发展路径，其中的虚线及点划线仍然表示我们上面讨论的两条单独的发展路径(即图 4 中的各条曲线)。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虽然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早期，城市政府将选择只向城市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图 5 中表现在各条实线都与虚线轨迹重合)，但随着城市经济的增长，存在着一个政策转型的“临界点”(对应于图 5(a)中实线开始偏离虚线轨迹的那个拐点)，在这个临界点以后，实行向农村移民平等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政策将更有利于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与此同时，城市部门的产出增长以及资本积累也将以更快的速率进行(图 5(b)、(c))，而城市化进程也会因为城乡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而加速(图 5(d))。事实上，此时由于收入差距的消失，城市社会的发展将不再因此而受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得到了有效的保证。而农村移民收入的提高将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这一方面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也使得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收入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上述分析可以归纳为如下命题：

**命题五：**即使城市政府只考虑本地户籍人口的当期利益，在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公共服务提供政策转型的临界点，此时，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均等化转型将是一个可以自发发生的、有利于提高城市居民和农村移民收入并促进城市化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内生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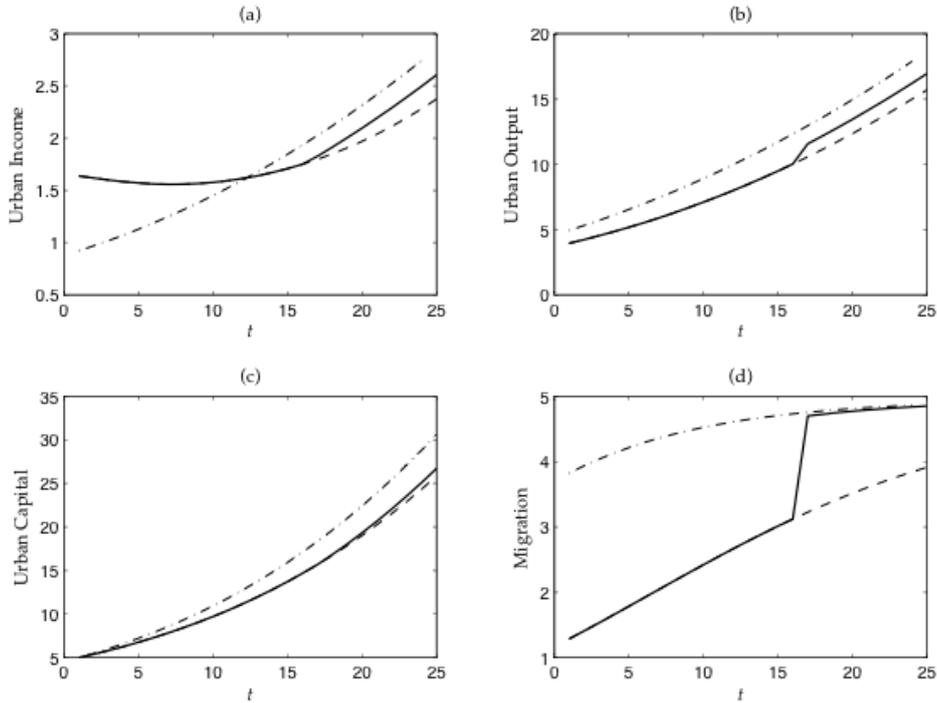


图 5 考虑本地居民当期收入时公共服务提供政策的最优选择与城市的发展路径

图 5 揭示的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城市政府出于保护本地居民利益而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实施公共服务的不均等提供政策，但由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城市长期经济发展的放缓和城市居民长期收入的下降。很明显，在图 5(b)、(c)中，尽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转型使城市部门的总产出和资本积累更快增长，但与一直实施公共服务平等提供的路径（即图中的点划线）相比，仍然是偏低的，而城市居民的收入也有类似现象（图 5(a)）。事实上，在我们的模型中，社会冲突所造成的损失主要还并不是其成本本身。换句话说，即使社会冲突直接带来的损失——社会冲突（犯罪等）造成的破坏以及防范冲突的非生产性投入——并不大，但只要这种损失阻碍了城市化进程，那么，由城市化进程的放缓所造成的损失将更大，这使得图 5 中，城市化和产出水平在政策未调整的第一阶段被严重压低了，并由于因此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而对城市的长期经济发展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图 5(a)中的政策转型临界点是晚于两条单独发展轨迹的交点的，这也可以理解为由于资本积累路径的影响，前一阶段政策的负面影响会被进一步放大。

### （三）政府关注城市居民长期收入时的内生政策转型

上面的分析说明，当城市居民因为政策转型可能带来短期内的收入下降而反对公共服务的公平提供，在长期来看对他们的福利事实上是不利的。认识到这一点，一个真正考虑城市居民福利的政府是否有可能采取更优的政策设计呢？我们不妨考虑一种理想的情况，假设政府以城市居民的长期总收入为目标函数，那么公共服务提供政策最优的转型时机是否会有所改变呢？即现在政府的选择问题为：

$$\max_T \sum_{t=0}^T c(t) + \sum_{t=T}^{\infty} c^E(t)$$

其中  $c(t)$  为政策转型前，即公共服务仅向城市居民提供时，城市居民的收入，满足(13)式及(6)式；而  $c^E(t)$  则为实现公共服务平等提供后城市居民的收入，满足(16)式及(17)式。该问题的数值模拟结果如图 6 所示。与只考虑城市居民的当期收入（图 5）相比，考虑城市居民的

长期收入将会使转型临界点提前,即城市部门经济加速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时间会更早地到来。但在转型临界点后,城市居民的收入会经历短暂的下降,而其带来的收益是城市社会的和谐融合,以及城市经济社会更快的发展速度,城市居民的收入也因此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可以总结为如下命题:

命题六:当城市政府考虑本地居民的长期利益时,不仅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均等化转型是一个可以自发发生的、促进城市化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内生过程,而且公共服务提供政策转型的临界点会较早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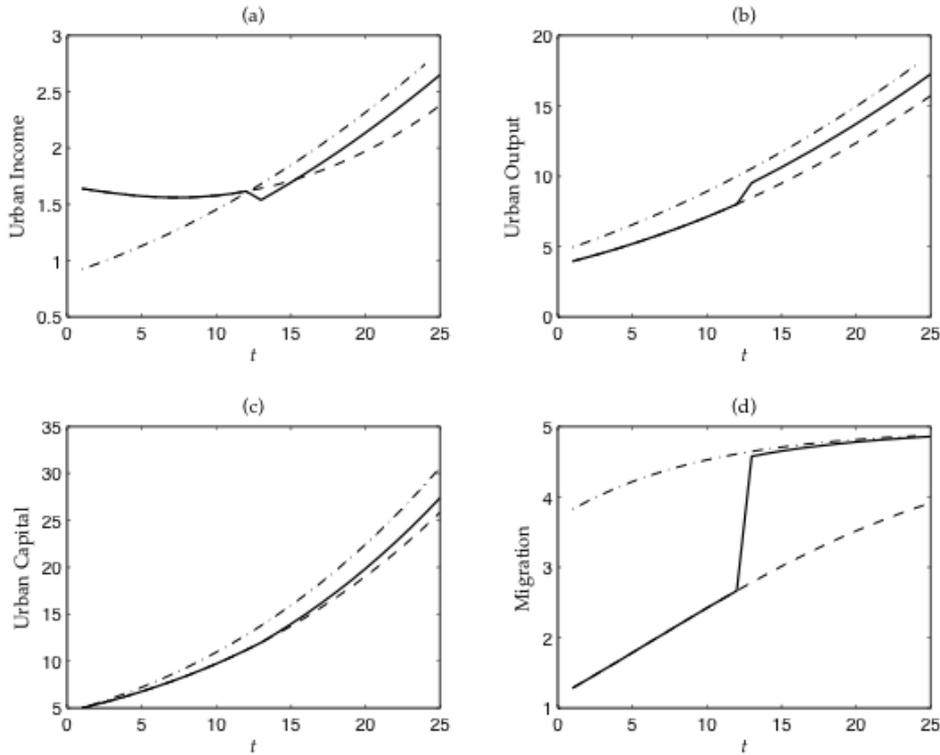


图 6 考虑本地居民长期收入时公共服务提供政策的最优选择与城市的发展路径

城市居民收入在短期内的下降换来长期内更快的增长,这体现出了一个有远见的政府在政策选择中的智慧。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在模型中为这个有智慧的政府设置时间偏好,如果考虑到政府也往往更偏好当前的利益的话,那么,实际的政策转折的临界点将介于图 5 和图 6 的模拟结果的中间。

值得注意的是,图 5 及图 6 中转型临界点处出现的斜线表示的是临界点前后两期的突变,并不是政策的渐变过程。我们的模型将城市政府的政策选择简化为一种 0-1 选择,政策的转型是离散的、突变的,因此图 5 和图 6 中的转型临界点都表现为函数值的跳跃。事实上,现实中的政策变迁更可能是连续的、渐变的,图 5 和图 6 中跳跃的曲线在现实中可能是逐渐升高的。

#### (四) 内生政策转型时点的比较静态分析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各参数取值的变化对转型临界点的影响。这里我们仅仅改变某个参数的取值,令其它参数保持表 1 中的取值不变,每个参数都是从较小的取值开始,逐渐增大,

并且取值范围局限在表 1 取值的附近。转型临界点的变化情况如表 2 所示。从表 2 中我们可以发现，至少在我们的取值范围中，各参数对结果的影响都是单调的。其中， $\alpha$  和  $\beta$  分别表示城市生产函数和农村生产函数里劳动的产出弹性，如果在城市劳动的产出弹性越大，那么，限制移民的流入就损失更大，城乡融合的政策转型就来得更早。反之，如果在农村的劳动产出弹性更大，那么，城乡融合的政策转型来得就更晚。 $N$  是农村的总劳动力，如果其数量越大，那么，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更低，这时，就需要更早地实现城乡融合来避免由城乡差距造成的损失。更多的城市初始资本存量  $K(0)$  同样使城乡差距造成的损失更早达到临界规模，从而要求城乡融合提早到来。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敏感度( $\theta$ )和移民规模对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的放大系数( $\varphi$ )都会提高城市的资本损耗，城市化受限所带来的损失就更大，城乡融合也会提前。限于篇幅，我们不作详细的证明了。

表 2 各参数取值增大对转型临界点的影响

参数	$\alpha$	$\beta$	$N$	$K(0)$	$\theta$	$\varphi$
转型临界点到来的时间	提前	推迟	提前	提前	提前	提前

## 五、结论

发展的过程不只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它还是一个移民与原有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过程。本文构建了一个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内生政策理论，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模型的重点。我们证明，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早期，对于移民的歧视可能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但当城市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城市里移民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对于移民的公共服务歧视就可能加剧城市内部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冲突，而这又将造成社会资源的非生产性消耗，这时，通过社会融合来减少收入差距和社会冲突，就可能有利于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城市化进程、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共同提高。

在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进程中，城乡间和城市内部的“从分割到融合”有三个层次。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所刻画的是最基本的“空间融合”，即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农民“搬到”城市里工作和居住。而陈钊和陆铭（2008）的理论工作说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是实现不同户籍身份人口间的“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将有利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和谐发展，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说明，即使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消除了，户籍身份差异所造成的公共服务不均等仍然可能加剧社会冲突，给城市和谐发展带来隐患，这时，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策，实现不同户籍人口间的“权力融合”将最终消除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进一步促进城市化和城市和谐发展，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在陈钊和陆铭（2008）的研究中，“权力融合”必须借助于外生的政治体制改革，赋予不同户籍人口同等的决策参与权，而在本文中，“权力融合”也能够通过城市决策者的内生的政策变迁来实现。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将分析集中于由户籍身份差异导致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和福利差异，本文没有考虑与户籍相关联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陈钊和陆铭，2008；陈钊、陆铭和佐藤宏，2009）。因此，在我们模型的结果中，社会融合政策实施之前，不同户籍身份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有所缩小的，这与经验事实不符。这既是本文的一个理论上的不足，同时也反过来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理解不同户籍身份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如果将公共服务的享受计入实际所得（或福利），那么，社会融合政策的实施将缩小不同户籍身份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sup>①</sup>我们的模型也没有考虑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之间在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而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不同户籍身份的人口之间。

<sup>①</sup> 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内部的社会冲突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倒 U 形”关系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而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上出现了转变很有可能是转折点出现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城市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制度下,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仅是公共服务质量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且与居民的收入等各方面相关,而后者则是一种“有”与“无”的差别,而且完全是由于公共服务提供的制度安排造成的。此外,出于简化分析的目的,我们也没有考虑城市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

中国的城市化体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也说明了发展不应只是经济的发展,而应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在既定的政治结构和政策形成机制下,社会的强势群体往往会制定更有利于自己的经济政策,但这却会同时带来社会分割、不平等和冲突,最终对可持续的发展不利,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可能使发展陷于停滞。我们的理论虽然说的是中国城市化的故事,但其刻画的理论机制却对于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具有一般的意义。在拉丁美洲、在印度、在非洲,持续的社会分割已经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形成了危害,在欧盟东扩中的西欧国家,在国际移民浪潮之下的美国,由身份差异所造成的矛盾与冲突也备受关注。在当今世界,“和谐发展”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者的现实选择。

## 参考文献

蔡昉、都阳和王美艳(2003):《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春良和易君健(2009):《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基于中国省级面板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第1期。

陈钊和陆铭(2008):《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第1期。

陈钊、陆铭和佐藤宏(2009):《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经济研究》第10期。

樊鹏和易君健(2009):《地方分权、社会犯罪与国家强制能力增长——基于改革时期中国公安财政经费发展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2期。

李实和佐藤宏(2004):《经济转型的代价——中国城市失业、贫困、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陆铭和陈钊(2004):《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研究》第6期。

陆铭和蒋仕卿(2008):《城市“二元社会”里的悲喜:户籍、身份收入差距和参照对象差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

万广华(2006):《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均等:方法和证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汪汇、陈钊和陆铭(2009):《户籍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第10期。

Acemoglu, Daron; Aghion, Philippe and Zilibotti, Fabrizio. “Growth, Development, and Appropriate Versus Inappropriate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 2006.

Acemoglu, Daron and Robinson James A.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Growth,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4), pp. 1167-1199.

Benhabib, J. and Rustichini A. “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1(1), pp. 129-146.

Blau, Judith R. and Blau Peter M. “The Cost of Inequality: Metropolitan Structure and

- Violent Cri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2, 47(1), pp. 114-129.
- de Soto, Hernando.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Basic Books, 2000.
- , Hernando. *The Other Path: The Economic Answer to Terrorism*. Basic Books, 2002.
- Fajnzylber, Pablo, Lederman, Daniel and Loayza, Norman. “Inequality and Violent Crim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02, 45(1): pp. 1-40.
- Galor, Oded and Moav, Omer.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4, 71(4), pp. 1001-1026.
- . “Das Human-Kapital: A Theory of the Demise of the Class Structur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1), pp. 85-117.
- Harris, John R. and Todaro, Michael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1), pp. 126-142.
- Kelly, Morgan. “Inequality and Crim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0, 82(4), pp. 530-539.
- Knight, John and Gunatilaka, Ramani. “Aspirations, Adapt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Working Paper, 2008. <http://www.economics.ox.ac.uk/research/WP/pdf/paper381.pdf>.
- Knight, John and Song, Lina. “Increasing Urban Wage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3, 11, pp. 597-619.
- Lewis, William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 pp. 139-191.
- Lipton, Michael.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Cambridge, MA.
- Lu, Ming and Chen, Zhao. “Urbanization, Urban-Biased Policies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87-2001,” *Chinese Economy*, 2006, 39(3), pp. 42-63.
- Lucas, Robert E. “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2, S29-S59.
- Meng, Xin, and Bai, Nansheng. “How Much Have the Wages of Unskilled Workers in China Increased: Data from Seven Factories in Guangdong.” Ross Garnaut and Ligang Song ed.: *China: 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 Asia Pacific Press, 2007, pp. 151-175.
- Ranis, Gustav and Fei, John CH.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4), pp. 533-565.
- Stewart, Frances. “Crisis Prevention: Tackling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28(3), pp. 245–262.
- .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 CRISE Working Paper, 2002, <http://www.crise.ox.ac.uk/pubs/workingpaper1.pdf>.
- Todaro, Michael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1), pp. 138-148.
- Zhang, Dandan, and Meng, Xin. “Assimilation or Disassimilation?—The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conference on Chinese economy, CERDI-IDREC, Clermont-Ferrand, France, on Oct. 18-19, 2007.